

[編者按]為客觀記錄和梳理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在中國歷史學研究領域的特點和趨勢，提高歷史學的社會關注度，傳播和弘揚中華歷史文化，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澳門大學《南國學術》編輯部自2017年起，組織專門力量，開展了年度性的“中國歷史學研究十大熱點”評選活動。這次是第二屆，觀察範圍包括2018年度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史學理論及史學史等領域的熱點話題。通過學界推薦、數據分析、學者研討、專家評議、投票選擇等程序，評選出了“2018年度中國歷史學研究十大熱點”，現予以發佈。

2018年度中國歷史學研究十大熱點

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

澳門大學《南國學術》編輯部

熱點一：公共闡釋理論視野下的歷史闡釋學

熱點介紹：人類社會的繼承和發展，離不開對政治、文化、法律、經驗、教訓、認知、規範和歷史知識的闡釋。近些年，中國學者在反思和批判西方“強制闡釋”的過程中，總結和提煉出“公共闡釋”的新概念，旨在為建構當代中國闡釋學基本框架確立一個核心範疇。公共闡釋理論的提出，引發了學者們的廣泛關注和討論。在歷史研究領域，歷史闡釋不斷製造出各種各樣的觀念，從而促進了人類知識的生產。2018年，學者們致力於推動當代中國歷史闡釋學的架構，主要探討以下重點問題：（1）歷史闡釋應該關注的限度，包括歷史闡釋的主體限度、歷史闡釋的價值限度、價值評價的歷史限度、歷史敘述的限度。（2）歷史闡釋的範式問題，即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南，為闡釋設置邊界。闡釋必須基於客觀歷史事實、理性認知和一定社會現實的基礎。（3）歷史編纂的根本任務問題，即歷史敘述和歷史內容融為一體，再現歷史真實。（4）作為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的科學，歷史記錄的是發展大勢，是歷史規律的探索和確證，而非碎片化的個人經歷和記憶。

文章舉例：

1. 《闡釋學與歷史闡釋》（于沛，《歷史研究》2018年第1期）
2. 《重識〈滿與漢〉——兼論與“新清史”研究的關係》（王志通，《史學理論研究》2018年第1期）
3. 《創造性闡釋：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的跨語際實踐——以瞿秋白的〈社會哲學概論〉和〈現代社會學〉為例》（路寬，《中共黨史研究》2018年第1期）
4. 《唯物史觀與創造性闡釋傳統學術精華》（陳其泰，《中國史研究》2018年第2期）
5. 《認識的普遍性與闡釋的公共性——從認識論到闡釋學的思想史解構與重建》（張政文，《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



專家點評：歷史研究的過程，特別是史學文本的書寫過程，是對歷史的闡釋過程。適應以中國理論闡釋中國經驗的時代需求，闡釋的內在屬性與規律，日益受到中國學者的關注。2017年，中國學者張江在反思和批判西方強制闡釋的過程中，正式提出“公共闡釋”概念，以期為建構當代中國闡釋學基本框架確立一個核心範疇，引發了文藝理論界、史學界、哲學界的討論。在各種闡釋活動中，歷史闡釋受制於闡釋對象的約束最為強烈，公共性的要求最為明顯。因此，在2018年，圍繞公共闡釋基礎性原

則，史學界不僅從學理上進行了探討，還從特定案例出發，對公共闡釋理論進行了驗證。這項具有融通理論思考與實證考辨性質的跨界研究，標誌着中國史學界對於碎片化現象的厭棄已經達到高度理性的階段，是史學界理論興趣回歸、宏大敘事熱情重啓的界碑。討論中的基本共識是，公共闡釋是歷史闡釋的本質要素，是中國歷史闡釋的核心維度，史學界應長期深入研究，以期形成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闡釋學理論。

（點評人：李紅岩，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副總編輯、研究員）

熱點二：口述歷史理論、方法與實踐

熱點介紹：近二十年來，口述歷史越來越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關注和重視。在歷史學學科的意義上，口述歷史主要是指運用口述訪談的方法獲取口述史料，採集、整理與保存當事人（親歷者、見證者、受訪者、口述者等）的歷史記憶，呈現當事人親歷的歷史真實。口述歷史對歷史研究的價值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是拓展了歷史資料收集的範圍；二是改變了傳統歷史研究的範式和書寫方式。2018年，學術界在口述歷史的理論、方法、實踐方面取得重大進展：（1）對公共史學視野下的口述歷史進行理論探討，構建包括口述歷史在內的中國公共史學學科體系，以“自下而上”的角度研究歷史，由精英史向公衆史轉向。（2）改革開放四十年口述史，包括改革開放政策的制定者、參與者以及重大改革事件的親歷者口述史，全國各省區市的改革開放歷程等。（3）抗戰口述史，包括對抗日老戰士口述史資料搶救整理，對抗戰口述史的梳理與反思等。（4）對口述歷史資料收集與保存方式的研究，包括口述歷史技術載體的變遷，高校圖書館口述歷史文獻的保存與創建等。

文章舉例：

- 1.《何種歷史：公共史學視野下的口述歷史》（王艷勤，《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
- 2.《對“口述史”的理解和認知》（沈洽，《口述史研究》2018年第2輯）
- 3.《多維度推進的中國口述歷史》（左玉河，《浙江學刊》2018年第3期）
- 4.《從錄音機到萬維網：口述歷史技術載體的變遷及其影響》（張詩陽，《高校圖書館工作》2018年第3期）
- 5.《抗戰軍事史口述回憶的“蔽”與“弊”——以台兒莊戰役為中心的考察》（金之夏，《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8年第4期）



專家點評：中國口述歷史呈現出多維度推進的發展態勢，形成了多元化的發展格局，出現了多樣性的採集方式及其成果呈現方式。多維度、多元化和多樣性，構成了中國口述歷史發展的基本特徵。2018年的中國口述歷史研究，繼續沿着多元化的路徑快速推進，並廣泛應用到公衆史學、影視史學、紀錄片拍攝、歷史記憶保存、方誌學、圖書館學研究等領域。同時，口述歷史的規範化問題引起了學界高度重視。如果不注重口述歷史的規範化操作，將會出現嚴重的學術失範和法律糾紛。在衆聲喧嘩、大眾參與的多元化推進態勢下，中國口述歷史已經發展到規範化操作的新階段。

為此，必須牢固樹立規範意識，遵守道德規範、學術規範和法律規範，有序推進口述歷史的發展。由此可以預測，探索適用於不同學科和不同領域的口述訪談規範，自覺地強化口述歷史的規範化操作，將是中國口述歷史未來發展的方向。

（點評人：左玉河，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研究員，中華口述歷史研究會秘書長）

熱點三：新出簡牘文獻對古代社會研究的推動

熱點介紹：20世紀以來，中國出土大量簡牘資料，為戰國、秦漢、三國、魏晉歷史研究提供

了彌足珍貴的第一手資料。近年來，不斷出土或發現的簡牘如湖南省張家界古人堤簡牘、長沙市東牌樓東漢簡牘，安徽省天長市西漢墓漢簡，廣東省廣州市南越國宮署遺址西漢木簡，湖北省荊州市松柏木牘，以及清華簡等，為古代漢語、古代史、古代社會史、古代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材料，對一些新興學科的發展也起到前所未有的推動作用，成為一代學術新的增長點，“簡牘學”已發展成為國際性顯學。2018年，學者共同關注新獲簡牘資料，合力攻關，成果迭出：（1）對清華簡的整理與研究。陸續公佈的清華簡，印證了夏代的歷史文獻，補充了商代的歷史，修正了部分西周史，豐富了春秋史和社會文化史研究的材料等。（2）簡牘資料攜載大量人文地理信息，為古代地理問題研究帶來新線索和新機會，從而使“簡牘地理學”從醞釀到逐漸成形。（3）從簡牘資料研究秦漢時期田租徵收、債務償還等社會經濟問題。（4）簡牘文獻與祭祀儀式研究，如簡牘中的“祭祀”與“禱祠”、對清華簡反映的上古禮樂制度等。

文章舉例：

- 1.《從新出簡牘看秦田租的徵收方式》（李恒全，《中國經濟史研究》2018年第2期）
- 2.《出土簡牘所見“祭祀”與“禱祠”》（楊華，《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2期）
- 3.《清華簡〈虞夏殷周之治〉與上古禮樂制度》（石小力，《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
- 4.《簡牘所見秦漢時期債務償還問題芻議》（張燕蕊，《史學月刊》2018年第6期）
- 5.《論秦始皇“書同文字”政策的內涵及影響——兼論判斷出土秦文獻文本年代的重要標尺》（田烽，《“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9本，2018年）



專家點評：中國科學意義上的簡牘發現，始於20世紀初葉。最近五十年間，簡牘的出土地點由西北一隅拓展到內地廣大地區，遺存年代由漢晉上溯到秦至戰國，文獻內容由比較單一的屯戍相關文書擴充到法律文獻、官私文書、卜筮記錄、喪葬記錄與各種典籍，涵蓋古代社會政治、經濟、軍事、科技與文化、思想等諸多領域。作為古人手筆的真迹，簡牘包含珍貴而豐富的歷史信息，具有極其重要的文物、文獻、文化價值，在中國歷史研究和中華文明傳承方面有着傳世文獻和其他出土文獻無可替代的獨特作用。近几年新出簡牘資料對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推進，全面而深刻。戰國、秦漢時期地方行政體系，如郡縣設置、郡縣鄉里的構成及運作，戶口登記和管理，土地分配與賦稅徵收、徭役興發等問題，達致前所未有的認知。秦漢律令體系及其具體條文的解讀，相關法制史內涵的揭示，取得重大進展。戰國時期以儒、道為主的學術著作的撰著和流傳情狀，越來越清晰地再現出來。曆法、算術、病方等科學技術領域的成就，得到比較系統、細緻的復原。人們有理由相信，再用一二十年時間解讀考索，一定能夠透過浩繁、有的還十分瑣碎的簡牘文獻，形成對於戰國秦漢史的全新認識。

（點評人：陳偉，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熱點四：古代應災政策的演變與實踐

熱點介紹：災害及其治理是中國古代王朝政治和社會發展的重要議題。古代頻繁發生的災害不僅破壞了農業經濟的發展，造成人口大量減少或大規模遷徙，而且嚴重威脅社會的安全、穩定和發展。為了應對這些災害，中國從上至下採取了多種方法和策略，並保存有豐富的文獻資料。先秦以來，中國人的災害認知與防災救災意識隨着時代的變化而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以君主為中心的傳統天道觀；以政府為中心的近代科技觀；以社會為中心的現代生態觀。2018年，

學者圍繞古代應災政策作了如下探討：（1）歷代中央政府應災的政策、行為、政治倫理的變化和發展，重點關注了唐代和清代的相關情況。（2）地方政府應對災害的策略、實踐、思想和具體活動，並從不同的時空視角重點考察了具有代表性和影響力的個案。（3）對災害史研究範式和方法的關注，從災害現象透視社會深層問題，構建災害與社會的多維層域，並引入大數據、新技術、全球史視域等新方法，實現範式的轉變與路徑突破。（4）對環境視域下的災害、歷史災害地理、災害文獻等的研究等。

文章舉例：

- 1.《唐後期應災政策的演變及其實踐探析——以江淮地區為中心》（李殷，《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18年第2期）
- 2.《清代災賑資料的生成及相關問題——以乾隆朝為中心的考察》（楊雙利，《清史研究》2018年第3期）
- 3.《清代災後土地原價回贖政策》（劉宗志，《歷史檔案》2018年第4期）
- 4.《災荒危機與地方社會——咸豐年間桐鄉知縣戴槃的活動與記述》（馮賢亮，《史學集刊》2018年第5期）
- 5.《修德與漢唐國家應災的政治倫理》（閔祥鵬，《社會科學》2018年第9期）



專家點評：自《周禮》講荒政十二策以來，歷代王朝應對自然災害，無論是理念上還是行動上，都是以官府為主，不但制定有相關的法令、政策，還有具體的制度與措施，更有思想見解與具體實踐。從2018年學術界對古代應災政策的研究來看，依然是圍繞着這些問題進行的，成績有目共睹，但也存在一些缺憾。諸如在時代方面，關注漢、唐、宋、明、清等典型朝代，其他時代則少有論及；在具體對策方面，集中在帝王及官僚士大夫的所作所為，很少論及其他群體及一般民眾的行為；在應災成效方面，褒揚肯定者多，失敗教訓總結者少；研究也比較零碎、片面、分散，缺乏縱向與橫向比較等。中國歷代王朝都以農業為本，在廣袤的疆域裏，所面臨的地理位置與自然環境是複雜的，因此各種自然災害頻繁，在與自然災害進行不懈抗爭的過程中，除了以王朝及官府為主導的應災政策與措施之外，也不斷摸索創新，試圖構建官民相得的社會救助體系。相信學術界未來在多學科綜合研究的基礎上，還會對中國古代應災政策進行多方面且深入具體的研究。

（點評人：柏樟，南開大學法學院/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雙聘教授，安徽理工大學特聘教授）

熱點五：邊疆研究新成果與邊疆學學科建設

熱點介紹：邊疆研究是一門極具現實意義的學問，直接服從和服務於國家利益。中國的邊疆概念與內涵有着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內容，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不斷成熟和系統化。古代中國留存下來的大量關於邊疆自然、文化、風俗、政治，以及與內地關係的檔案文獻，為邊疆研究提供了堅實的史料依據。近年來，隨着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不斷提高，面臨的國際形勢也在發生深刻變化，邊疆對於國家發展的意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更加突出。由邊疆研究到邊疆學，其學科建設是一個漸進的、複雜的過程，需要學者們長期持續的探討。2018年，學術界繼續推進邊疆和邊疆學研究，重點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對建構中國特色邊疆學的討論，包括中國邊疆學話語體系、學術體系建設，新時期中國邊疆史研究的客觀要求等。（2）對中國邊疆研究歷史嬗變的回顧與反思，包括“中國邊疆”和邊疆研究的內涵與特徵、民國時期邊疆研究對於當代的啟示等。（3）清代的民族觀、疆域觀、外交觀研究，尤其是從典型個案如“安南勘界案”進行觀察與反思。（4）對邊疆地區權責調適、人事安排等的研究。

文章舉例：

1. 《邊疆地理名稱與晚清川藏邊務——以“川邊”“西康”概念為考察中心》(鄒立波,《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8年第1期)
2. 《對“中國邊疆研究”概念的認識與界定——兼談“中國邊疆學”學術體系之建構》(李鴻賓,《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3期)
3. 《唐代東北邊疆戰略初探——以營州和幽州的分合關係為視角》(宋卿,《史學集刊》2018年第5期)
4. 《清末民初邊疆危機中的“政府外交”與“國民外交”糾葛及社會思想變遷》(曾榮,《江蘇社會科學》2018年第5期)
5. 《民國時期雲南邊地墾殖與邊疆開發研究》(羅群,《學術月刊》2018年第10期)



專家點評：2018年度的邊疆態勢可謂雲譎波詭，既有涉臺、涉藏、涉疆、涉南海等議題，又有東亞諸國及其與域外國家之間繁複交錯的縱橫捭闔。這些變幻的邊疆以及邊疆安全、周邊和諧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促使邊疆研究者積極回應。為此，在2018年度主要着眼於以下領域：一是聚焦“中華民族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及“加快邊疆發展，確保邊疆鞏固、邊境安全”“堅持陸海統籌，加快建設海洋強國”等理論；二是深耕邊疆史地、疆域理論與周邊關係等議題；三是關注海洋海疆歷史與現狀；四是凝視“一帶一路”的過去與今天；五是多視角嘗試構建中國邊疆學學科等，成果蔚為大觀。面對邊疆形勢的多變，調適中央與邊疆、邊疆社會穩定與發展、邊疆地區各類人群利益訴求、中國與海陸鄰國及域外大國之間的關係，亟需國家邊疆治理體系完善、邊疆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提升，進而運籌帷幄，應對得當。凡此種種，既需要體制層面的改進，更需要理論上的創新，而中國邊疆學學科如若成功建構，無疑會為國家邊疆治理提供學理上的支撐。

(點評人：于逢春，浙江師範大學教授、邊疆研究院院長)

熱點六：海洋史研究的新拓展與新特徵

熱點介紹：21世紀是海洋的世紀，海洋的保護、開發與利用已成為世界範圍關注的熱點。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利用海洋的國家之一，擁有悠久燦爛的海洋歷史文化。海洋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戰略空間，是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寶庫，海洋經濟在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全域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近年來，對海洋史的全面深入研究成為學術熱點。觀察與反思從陸地走向海洋的學術研究路徑，可以發現史學研究中的諸多問題。2018年，學者們圍繞海洋史研究，不斷拓展視角與領域，體現出新的特徵：(1) 海防體系與制度研究，尤其是明清時期對倭寇、海盜活動的防控，相關制度和體系的建立對當前海洋戰略仍具啓迪與現實意義。(2) 海上貿易研究，包括對海商群體的研究，對中國與歐洲及東南亞國家的商品貿易的研究，從海洋的視角反映中國與世界關係的發展及演變。(3) 與航船管理相關的研究，如船隻規制的變化與適用、國外來華商船的稅務徵收。(4) 深入發掘海洋文獻、考古等資料，研究相關海域歷史變遷和文化特色；運用相關理論、視角、方法對海洋社會的人群行為及歷史文化進行分析和研究。

文章舉例：

1. 《論兩次鴉片戰爭期間海患與水師巡洋制度之恢復》(王宏斌,《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2期)
2. 《明清時期中國東海、南海的海盜活動和記憶——兼與日本、中國、東南亞的宗教史迹印證》(松尾恒一,《南國學術》2018年第4期)

- 3.《從“鹽徒慣海”到“營謀運糧”：明末淮安水兵與東江集團關係探析》（王日根、陶仁義，《學術研究》2018年第4期）
- 4.《開海貿易、自然災害與氣候變遷——元代中國沿海的倭患及其原因新探》（馬光，《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
- 5.《清代方志輿圖的海防描繪——以《〈嘉興府志·海防圖〉為例》（何沛東，《海洋史研究》2018年第12輯）



專家點評：2018年中國海洋史研究成果相當可觀，相關中文論著（含學位論文）約400篇（部）。除傳統研究領域外，海洋環境與資源開發、海洋知識及海島等新領域均取得新成果；在全球史、多學科交叉視野引領下，大洋洲—南太平洋、印度洋海域史研究引起重視，並取得初步成果；域外官方涉海檔案、圖像資料、中國民間海洋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海上絲綢之路史料收集與成果出版，均有值得關注的進展；專業學術刊物如《海洋史研究》《海交史研究》《國家航海》等越辦越好，發表了不少高質量的論作，對海洋史研究起到重要的引領作用，影響越來越大；研究隊伍呈現年輕化趨勢，一批經過正規專業訓練、具有扎實史學功底、較強國際學術交流與對話能力的青年學人嶄露頭角，成為海洋史研究的重要力量，增添了活力。這些都說明，在國家海洋事業發展、“一帶一路”倡議推動下，在國內外學術潮流互相激蕩下，海洋史學界致力於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海洋史學體系，相關研究持續受到關注，融鑄新理論，啓動新動力，發展態勢良好，後勁甚足。

（點評人：李慶新，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

熱點七：絲綢之路史研究的新視野

熱點介紹：“絲綢之路”是指起始於古代中國，連接亞洲、歐洲和非洲的古代商貿、文化交流路線，包括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它不僅僅是一條商業通道，而是一條連接中國與世界的紐帶，古老的中華文明、印度文明、埃及文明、古希臘羅馬文明、美索不達米亞文明、中亞文明在這裏交會碰撞，推動了世界的進步和發展。“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是“絲綢之路”這一歷史名稱在當下的現實反映，引發學術界對絲綢之路史的持續關注。2018年，史學界對相關領域的研究拓展出新的視野：（1）對“絲綢之路”概念的形成及傳播進行全面梳理，對其內涵與外延進行廣泛深入的探討。（2）絲綢之路上以文本、器物為載體的文化交流，包括古籍文本、繪畫藝術、管弦樂器等，探討具體文化事象在區域間的傳播交流。（3）絲綢之路與宗教文化交流，涉及伊斯蘭教、佛教、基督教、祆教、摩尼教、道教等，從而觀照區域內宗教交往格局。（4）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研究，諸如廣州、泉州、福州、杭州等港口城市與東南亞、東北亞相關國家及地區間的商貿往來，及由此折射出的國家間關係及區域社會經濟的發展與變遷。

文章舉例：

- 1.《貞觀年間的絲路往來與敦煌翟家窟畫樣的來歷》（柴新江，《敦煌研究》2018年第1期）
- 2.《絲綢之路的文化傳承：筆箋在中國——明代以來霸州勝芳鎮音樂會淵源考》（萬明，《河北學刊》2018年第1期）
- 3.《絲路景教與汪古淵流——從呼和浩特白塔回鶻文題記Text Q談起》（白玉冬，《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2期）
- 4.《16—19世紀前期海上絲綢之路的絲綢棉布貿易》（范金民，《江海學刊》2018年第5期）
- 5.《“絲綢之路”概念的形成及其在中國的傳播》（劉進寶，《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11期）



專家點評：在“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動下，絲綢之路歷史研究近年來持續受到學術界關注，正由原來若干領域的區域史、專門史研究，逐步形成一個體系化的、獨立的學術領域。2018年的絲綢之路史研究表現出幾個顯著特徵：一是研究推向深入。既有學者對“絲綢之路”概念進行了扎實考辨和系統梳理，為絲綢之路歷史研究提供了正本清源的基點，也有學者通過絲綢之路上承載着豐富文化交流信息的文本、圖像、器物等闡幽發微，細密解讀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的方式和形態。二是研究視野更為宏觀。例如，通過絲綢之路上的宗教文化，包括伊斯蘭教、佛教、基督教、祆教、摩尼教、道教等的傳播，揭示源起於不同文明的宗教通過絲綢之路進行跨區域的交流。三是關注絲綢之路的整體研究。海上絲綢之路與陸上絲綢之路，是相互聯通、彼此互動的整體，構成了中國古代對外交往及絲綢之路覆蓋區域內各區域間交流互動的基本框架，有學者開始關注、倡導絲綢之路的整體研究。2018年，絲綢之路史的研究不僅有扎實的推進，取得了豐富的成果，而且為以後的研究打開了新的視野，奠定了新的起點。

(點評人：黃純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紫江學者特聘教授)

熱點八：晚清財政稅收的近代化轉型

熱點介紹：清代晚期是中國社會發生巨變的時期，也是近代化轉型時期，更是與西方世界的衝撞、接觸最為激蕩的時期。在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的強力干預下，中國傳統經濟結構開始瓦解，逐步捲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在此背景下，近代意義上的財政稅收因與經濟結構密切關聯而快速轉型，並成為經濟史學界長期持續關注的關鍵領域。2018年，相關研究在以下方面有較大進展：

(1) 晚清財政稅收體制的變遷。側重於從整體國家層面，探討晚清不同時期財政稅收制度體系的發展軌跡及變遷動因，進而呈現經濟社會轉型的整體趨勢。(2) 地方財政及專門機構的發展變革。諸如經徵局等機構的設立、財政監理官的選任與外派、雜稅雜捐的徵收等，對州縣財政稅收體制的形成與改革造成的影響。(3) 特定行業及稅種研究。諸如錢莊業與關稅、礦稅、地丁稅等，從細節着手，以小見大地呈現晚清財稅的演變軌迹。(4) 典型財稅問題研究。涉及海關兼管常關、財政協濟、息借商款等一系列特殊問題，由此進一步探究世界格局變遷與中國政治經濟發展間的關係。

文章舉例：

1. 《息借商款與晚清財政》(李文傑，《歷史研究》2018年第1期)
2. 《近代稅收史研究中的“稅”與“政”》(朱英，《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2期)
3. 《“大分流”之後的與時俱進——傳統錢莊業在近代中國的變化與特點》(朱蔭貴，《南國學術》2018年第3期)
4. 《試論清代財政體系的近代轉型》(倪玉平，《中國經濟史研究》2018年第4期)
5. 《“發覆見寶璧”：晚清戰時財政協濟研究散論》(劉增合，《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8期)



專家點評：財政稅收是一個國家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晚清財政稅收問題是經濟史學界方興未艾的關注熱點。晚清經濟史資料的發掘、整理與出版呈井噴之勢，這為財政稅收的近代轉型研究創造了條件。2018年，晚清財政稅收研究在深度融合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功能之後，形成了自身特色，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研究主題寬廣，既有涉及國家層面的研究(如財體制變遷、地方財政稅收機構發展等)，亦有微觀層面的探討(如錢莊業、關稅、礦稅、地丁稅等)，還有涉及具體財稅

問題的（如財政協濟、息借商款等）。二是研究方法多元，不僅有傳統史學的考證歸納，還包括量化史學的分析回歸，真正踐行“史無定法”的學術思想。三是研究視角新穎，在具體研究中，學者們既考慮中國財政稅收的傳統因素、路徑依賴，又將其置於國際環境變革的大背景下進行考量，重點闡述國際社會對晚清財政稅收的深刻影響。這使得晚清財政稅收的研究豐富多彩。借助史料的發掘、整理與甄別，未來可以加大相關問題的經濟學解讀與計量分析，以期進一步深化晚清財政稅收近代化轉型乃至經濟史研究。

（點評人：魏明孔，中國經濟史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熱點九：紀念戊戌變法一百二十週年

熱點介紹：戊戌變法發生在國際格局巨變的時期，維也納體系所代表的國際秩序不斷弱化，歐洲各大國協調機制失靈，均勢的協調讓位於諸國的競爭，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初步形成。區域強國崛起，霸權國家出現，中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清朝末年，國家道路是沿襲帝制之道，還是另行共和之路，各派新舊勢力在內外矛盾交織中展開決定國家命運的較量。2018年，學術界紀念戊戌變法兩甲子，主要是重現歷史事件的細節，重審其歷史意義：（1）史實論證。通過解析歷史檔案，豐富歷史事件的細節，再詮釋戊戌變法的歷史意義。（2）國際環境梳理。清廷後期的國際環境由朝貢貿易體系向條約體系轉變，清廷如何調整內外政策應對國際體系的轉型，尤其是通過向日本學習，重構對於當代國際體系的認知。（3）政體大辯論。近代中國啓蒙初期，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關於國體與政體之學說，帝制與共和之辯論，中國開始構建自身的國家理論。（4）思想啓蒙與學科構建。中國千年的儒學體系首先在文學、文化方面受到西學的衝擊，中國的學術體系納入全球體系，形成新的學科劃分並隨之演進。

文章舉例：

- 1.《戊戌變法與世界革命風雲——康有為與今文經學“革命”的困境》（陳建華，《南國學術》2018年第4期）
- 2.《美國駐華公使對戊戌變法的觀察》（崔志海，《史林》2018年第4期）
- 3.《日本對戊戌變法的認知、態度與戰略》（王美平，《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
- 4.《“宋案”重翻：戊戌黨禍之餘波》（張海榮，《安徽史學》2018年第6期）
- 5.《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楊天石、張弘，《社會科學論壇》2018年第6期）



專家點評：儘管戊戌變法史研究起點已經很高，對於變法的動因、過程、結局，特別是政變的細節如光緒皇帝、慈禧太后、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袁世凱等關鍵人物的表現，都已有相當細緻深入的研究，但是，2018年，適值這一事件發生兩甲子，學界對此領域的研究成果還是相當可觀。首先，對變法相關群體、人物的研究有新進展。對於以光緒皇帝為旗幟的“帝黨”與奉康有為做領袖的“康黨”的聯合，這種聯合的利弊得失，作了深入而清晰的剖析；對於力挺康有為的重要人物張蔭桓在變法過程中所起關鍵作用的揭示，對於服膺康有為、對變法起了重要推動作用的宋伯魯，包括宋在政變以後遭受頑固勢力持續迫害的過程研究，都有助於加深對於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理解。其次，對於變法影響有新揭示。戊戌變法不光是影響近代中國歷史進程的大事，也是列強矚目的世界大事，學術界以往對於英國的態度已很有研究，新成果對於美國、日本關於變法的長時期關注及其態度的變化作了仔細的梳理，讓人們更易看清變法在更加廣闊範圍內

的影響。再次，對於變法教訓有新總結。關於戊戌變法失敗的教訓，是常說常新的話題，在事件過去一百二十週年之際，在中國正在邁向世界強國的場景下，再來總結，其結論自有強烈的當下感受。

（點評人：熊月之，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復旦大學特聘教授）

熱點十：中美關係史研究的新進展

熱點介紹：中美關係是影響國際格局的重要變量，中美關係歷史研究持續成為學術熱點。同時，中美關係史一直又被認為是具有高度政治性和敏感性的學科，受到國家外交政策和政治意識形態的深刻影響。新中國建立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歷史學界不斷回顧、檢討、反思百年來兩國的互動歷史，新材料不斷公佈，新成果不斷涌現。2018年，學術界對中美關係史的研究，既有宏觀敘事，又聚焦微觀事件。具體表現在：（1）中國由朝貢貿易體系向條約體系轉變時期，在對外政策上的調適及其在社會上的適應性。（2）關注“非國家行為體”（non-state actors）在中美關係以及由此所及的多邊關係中的作用，如中美工程師協會不僅與美國本土工程學會聯結，與英國在上海的中華國際工程學會南北輝映，與中國本土工程師學會也有微妙的互動等。（3）將全方位關係，如經濟關係、文化交流、技術援助、工程合作、情報採集等納入國際關係研究的框架。（4）聚焦特殊歷史事件的考察，如太平洋戰爭下美軍攻臺之“鋪道計劃”（Operation Causeway）、臺北劉自然事件對中美關係走勢的影響等。

文章舉例：

- 1.《晚清時期中美條約關係的演變——從“搭便車”到“門戶開放”》（李育民，《人文雜誌》2018年第2期）
- 2.《中美工商業協進會與戰後中美經濟關係》（皇甫秋實，《中國經濟史研究》2018年第5期）
- 3.《推動工程國家——中美工程師協會在中國(1919—1941)》（吳翎君，《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5期）
- 4.《近代美國駐華領事館對華信息搜集探析——以“福建事變”為例》（熊秋良，《南京社會科學》2018年第5期）
- 5.《太平洋戰爭下美軍攻臺之計劃與轉折》（杜正宇，《“國史館”館刊》，第55期）



專家點評：毋庸置疑，中美關係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而最近一段中美關係的下滑令各界開始擔憂，中美兩國是否正陷入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崛起的中國和守成的美國之間是否真的會爆發戰爭。在學術界多數人熱衷於跟蹤和評價當前中美關係的現狀和推測可能走向的時候，史學界對中美關係史的研究也開始升溫，並逐漸深入，選題更加多樣，學理也更扎實。的確，要想更好地瞭解今天美國對華政策的動機，在歷史中尋找其發展脈絡和那些可能影響決策的傳統的和非傳統的因素和行為體，以及產生當時主流觀念的社會機制都是至關重要的。2018年，學術界對中美關係史的研究可謂是精彩紛呈、碩果累累，既有宏觀脈絡上的梳理，又有微觀事件的聚焦性剖析，而且填補了一些研究領域的空白，更好地幫助我們瞭解當時美國對華政策背後的機制性因素，為我們理解今天提供了有益的視角。總之，中美關係重要，史學界同仁們的努力更重要，他們在幫助我們釐清過去、理解現在和塑造未來。

（點評人：郝雨凡，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人文社科學院校長講席教授）